

寻找中国现代人的祖先(上)

◆ 吴新智

自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猿人化石以来,中国人都相信我们的祖先来自周口店。1965年又发现了更早的猿人——元谋猿人,说明我们更早的祖先还是在中国。20世纪中后期,非洲出土了大量比180万年前更早的人类化石,这使我们推测180万年前的祖先很可能来自非洲。当然,以上所指都是与我们面貌大不相同的古老型人类,而与我们面貌基本一致的现代人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夏娃假说”

1987年,3位美国遗传学家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称:根据对祖先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胎盘细胞线粒体的研究结果,祖先来自非洲的人DNA变异比来自其他大州的人都多。一般认为,线粒体变异的产生速率是恒定的。线粒体产生的变异越多,意味着积累这些变异的时间越长,因此非洲黑人的历史比其他地区的人都长。根据非洲黑人和非洲以外的人线粒体DNA变异的数量和当时所认为的变异速率,上述论文的作者们计算出非洲黑人的历史平均约为20万年,非洲以外地区的人的历史平均只有大约13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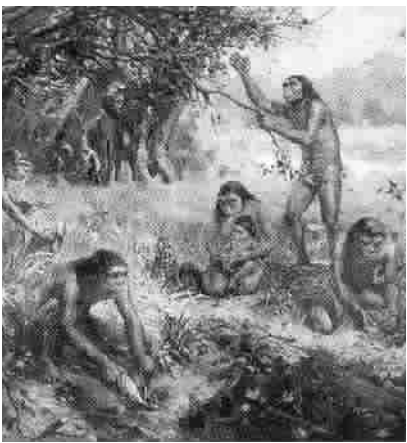
在男人的精子进入女人的卵子形成受精卵时,只有精子的头部进入卵子,尾巴留在外面,不参与受精过程。而线粒体在精子的尾部,所以下一代得自父亲的遗传物质只包括精子头部的细胞核,不包括父亲的线粒体,也就是说子女的线粒体只来自母亲,与父亲无关。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线粒

体,所以是经过母系向上推的,最后推到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她被认为是现代人的共同祖先。这就是“出自非洲说”,也称“夏娃假说”。为了与大约180万年前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的事件相区别,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近期出自非洲说”。这个假说主张,“夏娃”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亚洲和欧洲,虽然可能在非洲以外的广大地区与当地原有的古人类相遇,但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物种,相互之间不能杂交,结果完全地取代了原来生存在亚洲和欧洲的古老型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中国等地比13万年前还早的所有化石人类。所以该假说又被称为“完全取代假说”。此假说一经问世,便风靡整个西方世界。

从1999年起,有多篇关于现生

中国人Y染色体的遗传学论文认为,6万年前有一批非洲移民来到中国,完全取代了原住民,因此中国人全都是6万年前到来的非洲移民的后代。如此说来,不只是中国的猿人,甚至比6万年前更早的全部中国化石人类都不是我们的祖先了。

自“夏娃假说”出现以来,许多分子生物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材料继续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进行研究。虽然大多数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源自非洲的一小群共同祖先,但是不同研究组对这群祖先出现年代的研究得出相差很大的数据,最初是大大约30万年前,近些年最流行的说法是大约147万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也不再是1987年得出的13万年前,近些年最流行的说法改成大约6万年前。“夏娃假说”据以计算年代的基因突变率恒



定假设也受到严重的质疑,据英国《自然》杂志2015年3月报道,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突变率难以确定。

“多地区进化假说”

在“夏娃假说”问世前3年,沃尔波夫、笔者和桑恩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假说——“多地区进化假说”,主张世界上四大地区现代人的来源都与该地区更古老的人类不可分割。比如,东亚现代人主要源自中国的古人类,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欧洲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有遗传联系等。证据主要来自对化石形态的研究。该假说论证各地区人群之间有基因交流,将他们维系在一个多型的物种内。

究竟哪个假说更接近实际情况呢?让我们以中国为例检验一下。

化石的证据 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人类化石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上面部低矮;面部扁平;鼻区扁塌;眼眶和鼻腔前口之间骨面平或稍凹;眼眶呈长方形,外侧下缘圆钝;上颌骨颧突下缘弯曲;颌骨与鼻骨和额骨与上颌骨之间的骨缝构成一条大致水平的横弧线;有或强或弱的矢状脊;颌骨正中轮廓线最突出处在其下半;颅骨最宽处在颅长的中三分之一段;上门牙靠近舌头的那面呈铲形等。虽然这些特征在其他地区也有出现,却没有在中国那样普遍,所有这些特征组合在一个颅骨上出现的情况在其他地区更是没有。此外,6例北京猿人头盖骨中有4例有印加骨(即顶骨和枕骨之间的三角形小骨),从大荔、许家窑和丁村出土的顶骨化石上后角,石沟和穿洞出土的枕骨的上部形态判断,印加骨在我国早期和中期化石中可能有相当高的出现率,而在非洲和欧洲的化石人中则没有见过这种构造。共同特征的存在显然源于古人类在这个地区的连续发展。

链接

古人石器制造技术的几个模式

第一模式指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用石头简单敲打进行工具加工的技术;第二模式指旧石器时代初期,在加工过程中会比较细致地修整,使石器成为一种特殊形状的手斧的加工技术;第三模式指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制造莫斯特型石器技术,制造的石器比第二模式更精致;第四模式指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制造更精美石器的技术;第五模式指旧石器时代晚期制造细石器的技术,以复合工具为特色。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27.好评如潮

王兴仁告诉我,《芦荡火种》的服装是陈荣兰请妹妹熊玲设计的。陈荣兰在常熟深入生活时,发现茶馆的女老板通常腰系前后两片的竹裙,为了做好这条竹裙,剧团服装组可谓大动干戈,买来粗布,自染印花,前面还设计了图案,腰带是用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像梳辫子似的缠在腰上,后面还有一个结。《芦荡火种》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对上海乃至中国戏剧界现代戏的创演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容易啊。说起这些往事,她忍不住长嗟一声:陈荣兰走得太早了!

《芦荡火种》剧组走出杭州留下军营后,首演杭州胜利剧院就一炮打响,返沪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更是好评如潮。

春华秋实。1959年6月30日,沪剧现代戏《芦荡火种》正式定稿。关于剧本署名,陈荣兰定为集体创作,文牧执笔,导演杨文龙。

“上演税”的分成,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陈荣兰确定,文牧60%,3位有关人员40%,其中陈荣兰10%。这个分配比例,反映了上海人民沪剧团编导人员对《芦荡火种》的贡献率,也体现了陈荣兰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特质和先人后己的品格。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沪剧院一直坚持和沿袭这个分配比例,从陈荣兰和文牧等过世到如今,沪剧院历届领导仍如数将“上演税”分给编导人员的遗孀或子女。

这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动人心弦而又颇为奇特的景观:新四军纵队指挥员刘飞在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场上深情缅怀芦荡往事,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红色经典剧作诞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崔左夫的《血染着的姓名》、刘飞的《火种》、过鉴青和黄苇的《你是游击兵团》,三种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又有着不同表现形式的纪实和歌曲作品,共同为《芦荡火种》创作提供了扎实的历史佐证和丰厚的生活养料;上海人民沪剧团编导创作集体特别是剧作家文牧和新四军老战士陈荣兰联



袂创作,为珠联璧合打造史诗般的抗日正剧提供了坚实智力支持;亲历阳澄湖芦荡艰苦岁月的刘飞,还有把花样年华献给党和军队革命斗争事业的知识巾幗朱一等前辈,他们热忱而无私的帮助和鼎力支持,为文艺工作者最大限度逼近金戈铁马的烽火岁月,再现雄浑壮美的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画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上海人民沪剧团党组织和以陈荣兰、文牧、丁是娥为代表的演职人员,他们以奉献的精神进行的创造性劳动,为《芦荡火种》这朵中国戏剧百花园中的奇葩展蕊怒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60年1月17日,沪剧《芦荡火种》首次彩排,尔后正式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丁是娥饰阿庆嫂,解洪元饰郭建光,石筱英饰沙奶奶,邵滨孙饰刁德一,俞麟童饰胡传奎。全剧音乐设计为万智卿、沈开文、何树柏,舞美设计为魏征,灯光设计为蒋鉴明。

当时全国共有2800多个戏曲剧团,戏曲舞台上,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现代戏如凤毛麟角。《芦荡火种》的问世,无疑像一朵报春花,吸引了文艺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这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遵循戏剧艺术创作规律,植根革命现实主义深厚土壤,艺术地展现抗日战争特定阶段苏南革命武装斗争独具特色壮丽画卷的优秀原创性作品,在上海公演后,引起很大反响,“茶坊智斗”等场次尤为观众扬场击节。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移植《芦荡火种》,全国演出该剧的有31个剧团之多。随后3年,文牧和陈荣兰又根据演出实践发现的问题和艺术锤炼中产生的思想升华,对剧本作了多次修改。1963年,当修改后的《芦荡火种》再度搬上舞台时,演员阵容又略有调整。从此,《芦荡火种》成为上海人民沪剧团的优秀保留剧目。

1963年12月22日,应中共北京市委邀请,上海人民沪剧团《芦荡火种》剧组赴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1964年1月9日,由中国剧协等单位出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亲自主持,为沪剧《芦荡火种》在京组织专题座谈。周巍峙由衷地称赞:“沪剧团四次来京演出,一次比一次进步。”《人民日报》还发表戴不凡的剧评《喜看沪剧〈芦荡火种〉》。

2.一项又一项制度诞生了

广州增城市制定出台的《增城市“失独”家庭养老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现行扶助制度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500元扶助金,使城镇的每月可获补助金达到1950元,农村达到165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江西省对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的“失独”家庭最高补助八万元。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街道给每个“失独”老人免费安装一套援通呼叫器,老人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按钮呼叫,后台有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再将求助信息反馈给街道的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会迅速派员前往老人家中查看;给每个“失独”老人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对老人进行心理慰藉和开导;每年发放一千五百元的居家养老服务券,老人可以用服务券支付洗衣店洗衣、理发店理发等费用;提供托管中心服务,老人可以住进托管中心,中心配备医生,并提供食宿等。

各社会组织也各尽所能,搭建起各种平台,为“失独”家庭提供最便捷、最贴心、最有效的服务。广州市妇联启动了“玫瑰计划”,专门为“失独”母亲开展活动,关爱“失独”母亲的心理状况。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十余个“玫瑰服务站”,吸引了近两百名“失独”母亲及其家人参与,定期为妈妈们开展活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了“‘失独’母亲关爱计划”,2015年,在北京建立“失独”母亲社区帮扶站十五所,2016年达到三十六所,由专业人员为“失独”母亲提供音乐理疗、心理咨询等服务,“失独”母亲们在服务站还可享受免费午餐,并进行技能展示等各种交流。此外,还将为每个服务站配备一辆健康巡诊车,为“失独”母亲和家庭提供义诊服务。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起了“生育关怀”、“幸福工程”等活动。特别是“幸福工程”,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66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近十二亿元,帮助近三十万母亲脱贫,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之一,惠及人数近一百三十万人,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失独”母亲。

还有一些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失独”家庭

救助基金。一方面,国家及地方财政每年拨出足够数额的专项资金,作为“失独”家庭扶助基金的专项经费注入“失独”家庭基金账户;另一方面,卫计、民政等部门通过动员社会各界向“失独”家庭基金捐资,作为“失独”家庭基金的有益补充,在“失独”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时,可得到及时的救助和帮扶。

还有的地方成立了“失独”家庭的心理咨询机构,由卫计、民政等部门组织心理专家对“失独”家庭成员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逐渐走出“失独”阴影,将心理抚慰纳入社会保障。一旦有“失独”家庭出现,除了心理辅导外,还定期组织“失独”父母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娱等社会活动,为“失独”家庭释放精神上的压力提供渠道。一项又一项制度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一波又一波喜讯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制度和喜讯都凝结成一句话——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最终都将得到人民的尊敬,得到社会的回报。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中国人口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新特征。人口增长的快速列车就此启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5.8亿,十一年后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到6.95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猛增到10.08亿。有识之士无不为此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担忧,开始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将被自己的繁殖逐渐淹没。”著名经济和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更是以《新人口论》直接向共和国谏言:必须控制人口。

共和国的领袖们皱紧了忧虑的眉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计划生育”一词就此诞生。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人口非控制不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都不止一次作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指示。

1980年9月25日,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向全国发布,几千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